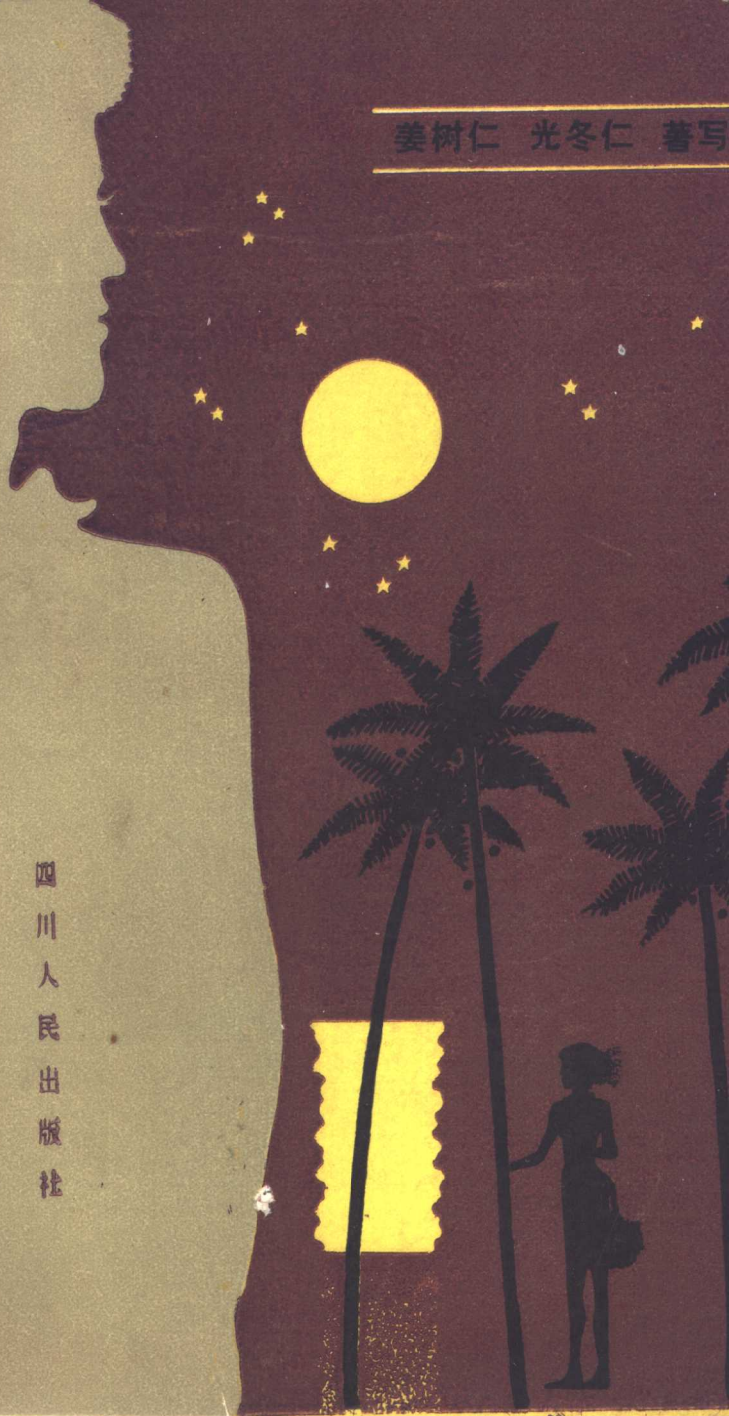


姜树仁 光冬仁 著写

身在异邦心在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





身在异邦心在国

华侨身世举隅

姜树仁 光冬仁

四川人民出版社

身在异邦心在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滨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 字数92千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50 册

书号: 3118·301

定价: 0.88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华侨身世 血泪斑斑.....	(3)
(一) 出现华侨的原因.....	(3)
(二) 出洋的苦难.....	(10)
1. 去印尼的“契约”华工的苦难.....	(10)
2. 去美国的“契约”华工的历程.....	(15)
二、寄人篱下 任人宰割.....	(19)
(一) 在印尼的“契约”华工的状况.....	(20)
(二) 中国劳工开发美国的劳绩及其处境.....	(26)
1. 建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线的华工.....	(27)
2. 开垦加利福尼亚州荒地的华工.....	(28)
3. 在加利福尼亚州种植园的华工.....	(30)
4. 在加利福尼亚州采矿的华工.....	(31)
(三) 早期在美国从事服务业的华侨.....	(33)
(四) 美国的排华运动.....	(42)
三、忍无可忍 奋起反抗.....	(49)
(一) 红溪今日水，又唱昨日歌—— 爪哇华侨反荷斗争.....	(50)

(二) 一页光荣史 豪气壮千秋——	
加里曼丹大港公司反荷斗争·····	(55)
(三) 石龙门举义 布洛克跳窗——	
沙捞越华侨反英斗争·····	(61)
四、身在异邦 心存祖国·····	(65)
(一) 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和动力·····	(65)
(二) 华侨投身爱国洪流·····	(71)
1、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功臣·····	(71)
2、声援“省港”大罢工·····	(78)
3、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84)
五、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87)
附 录：	
一、“为中国谋福利”	
——从容阅看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	(90)
二、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华侨领袖陈嘉庚简介·····	(116)

前 言

所谓华侨，是侨居在外国的中国人的称谓。这本来是明白无误的事。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我们到国外侨居的同胞，虽缘由种种，情况各异，但绝大部分是由于生活维艰，才不得已告别父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他们是和苦字连在一起的。这也是无须赘言的。然而，十年内乱，把许多事都搞得面目全非了。颠倒黑白，肆意罗织人罪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践踏党的侨务政策，视华侨为祖国的逆子，把侨眷侨属作为“里通外国”者而横加迫害。一时间，“海外关系”成了令人生畏的名词，把华侨搞得声名狼藉。

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侨务政策重新得到了贯彻落实，恢复了华侨的名誉，侨眷侨属蒙受的屈辱得到了平反昭雪，四海欢呼，五洲同庆。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兴起，回国观光和投资的华侨的日益增多，有的人又产生了另一误解，认为华侨是富有与幸福的同义词。而华侨之所以富有与幸福，在于外国一切都好，因而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向外倾向。

“四人帮”的诬陷有人将信将疑，现在的误解尚有人

在，两者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对华侨缺乏了解和认识。为了正确地了解和认识华侨的身世和心迹，使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同心同德地为振兴中华，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去，特编写这本小册子，以为读者提供一孔之见。

限于资料 and 水平，不当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专家、读者们批评指正。

一、华侨身世 血泪斑斑

（一） 出现华侨的原因

我国人民有牢固的乡土观念，既不轻易离开家乡，更不愿意离开祖国。

传统观念的束缚。春秋战国时代的我国第一个哲学家、教育家 and 政治活动家，我国儒家学派的鼻祖孔丘，到了西汉被抬到“神”的地位，尊为“万世师表”，从此，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一直处于支配的地位，支配着中国整个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思想。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父母在，不远游”等思想，一直作为正统思想灌输给人民，成了维系国家、家庭的纽带，把中国人和自己的国家、家乡、家庭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国家，家乡，家庭，象巨大的磁场，对中国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家庭感情的维系。我国历来被誉为“礼义之邦”，而“礼”和“义”又和“情”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养育之恩，夫妻之情，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恩情，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平平常常，一旦要离别或

分开了，就会体味到母子之情的崇高神圣，夫妻之情的纯洁忠贞。如若不信，请读下面两首诗：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游子吟》

试妾与君泪，
两处滴池水，
看奴芙蓉花，
今年为谁死！

——《怨诗》

这是我国唐代诗人孟郊写的。前者写母子的依依惜别，后者写夫妻的两地相思。宋朝大诗词家苏东坡认为孟郊“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就在于他看到和写出了慈母贤妻的至情。正是这种至情，使许多大丈夫难以迈出门。也正是这种至情，使父母、妻儿，宁愿一起在家过艰苦俭朴的生活，也不让儿子、丈夫离家远走。解放初期移风易俗，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时，在广东梅县地区出现了动员男人

参加劳动的笑话。因为，那里历来有不少男青年结婚之后，就把妻子放在家里，自己一人出洋谋生。出去之后，有的三年五载回来一趟；有的一去不复返，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为了不出现《怨诗》那样的情景，许多为人妻子者宁愿自己养活丈夫。久而久之，形成了妇女出去干活，男人在家看孩子的风俗。谁养不住丈夫，男人出洋了，谁就会被讥为没有能耐。这种反常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洋谋生决不是一件好事的实质。

祖国的土地足够养育自己的儿女。有人认为，中国出洋谋生的人多，是由于人口多的原因，这是没有根据的，十八世纪中期，中国才一亿四千多万人口。十九世纪初，也只有三亿人口。在正常情况下，河山锦绣，地大物博的国土，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国内不但能够生存，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

政府法令不许移居国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有法令规定，凡擅自移居外国者，要施予杀头的惩罚。这条法令，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始终起着阻遏中国人外迁的作用。

那么，除了少数冒险致富、漫游求乐、经商和留学者之外，为什么仍有一部分不顾伦理的谴责，忍受感情的折磨，冒着杀头的危险，孤身一人，出洋谋生呢？

鸦片战争爆发后，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小农经济制度日益瓦解，千百万人无事可做，不得不到国外谋生。这是出现华侨的国内原因。

我们的封建帝国，虽有与外国通商的历史，出现过“丝

绸之路”那样的贸易通衢；但总的来说，是以重农抑商，自给自足，闭关锁国为基本国策的。因此，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商品生产已经飞跃发展的时代，我国的清代统治者仍然希望国民闭关自守，不愿意与西方国家有过多的接触和贸易。关于这一思想，乾隆皇帝在1790年对英王乔治三世说得十分明白：

我们天朝拥有各种丰富的物资，而在其所辖四境之内，并无匮乏。因此，我们无须从外国进口物资，作为与本国物资的交换。但是，我们天朝的产品，如茶、丝、瓷器，一向为你们和欧洲其他国家所需，我们为了表示友善，特别允许你们在广州设立外贸机构。

——（引自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三联书店 香港分店 1984年出版）

然而，西方列强不接受这样的“友善”。以掠夺原料产地和开辟商品市场为目标的殖民者，早就窥觊上了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英国的棉布和毛织品等不断地输入我国。自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转给私商手中之后，许多商品和鸦片，大量输入我国，造成国内白银外流，财政日紧。当清朝政府试图抵制时，以英国为祸首的西方列强，决心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于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把中国打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王朝积贫积弱的必然结果。这个一度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封建王朝，到了它的第四代皇帝乾隆之后，由发展的顶峰转向了衰败。官吏贪污盛行，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竟敢把修筑沟渠水坝的经费，全部侵吞，造成河水经常泛滥，农田无法灌溉，耕地愈来愈少，破坏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许多农民因缺少耕地而生活无着。通货膨胀，统治阶级增加赋税，使许多小手工业者破产。南方沿海地区的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无法忍受痛苦，一些身强力壮而又有技艺的人，就不得不冒着危险，到海外去碰碰运气了。

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到处掠夺土地，开垦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出现华侨的国际原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向全世界展开了掠夺。它们需要大量的劳工从殖民地采集原料，以供国内日益扩张的工业需要。到了十九世纪中期，由于殖民者实行残酷的强迫种植制，使一些殖民地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这样，就需要从别处招募劳动力来填补。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实行强迫种植制，造成当地人口大量死亡，转而向我国拐骗劫掠劳动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荷兰殖民者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侵略印度尼西亚的。1596年，荷兰开始入侵印度尼西亚，然后把葡萄牙排挤出去。1602年，荷兰把各个同印尼进行贸易的公司合并为统一的东印度公司。这是荷兰人在印尼建立殖民帝国的开端。东

印度公司在印尼征募军队，建筑炮台，发行货币，任命官吏，代表荷兰国会和外国缔结条约。它实际上是一个殖民统治机构。1800年，这个公司结束，把侵占的地方让给了国家。为了少数商业资本家的利润，荷兰政府不但继续使用东印度公司时期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独立剥削方法，而且凭借政治势力夺取更多的利润。1830年，首先在爪哇推行旨在对劳动力进行高度剥削的强迫种植制，不但由国家垄断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切贸易和生产，而且规定农民必须划出五分之一以上的最好土地，用大部分时间优先种好政府指定的咖啡、烟、胡椒等高价作物，全部收获送交政府仓库。此外，还强迫农民缴纳地租、开渠、筑路。

在荷兰殖民者和本国封建主的双重压迫剥削下，爪哇人民生活极为痛苦。1844年，井里汶、淡目、格罗、波甘发等地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人祸天灾下，死了七万多人，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然而，荷兰殖民者贪婪的胃口反而越张越大，不断地向外岛掠夺土地，扩大剥削范围，建筑供军事运输和原料、产品运输之用的公路、桥梁。为了找到修筑这些公路、桥梁的劳动力，荷兰殖民者就不断地向外掳掠奴隶。我国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正是适应了荷兰殖民者的需要，而被大量骗到印尼去的。

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加深了阶级矛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清政府为了削弱反抗力量，维护其统治地位，放任人民大量出洋。这是加速中国人民出洋谋生的政治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1842年被迫同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五口通商，剥夺了中国用关税来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的权利。其他西方列强，也以英国为例，要求分享利益。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给予美国在贸易和其他方面最惠国待遇，规定美国公民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约束，这实际上是授予美国领事治外法权。法国也援例与中国订立了《黄埔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以战败国的身分，同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赔款军费六百万两，允许外国人在北京居住和传教，增设通商口岸。这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大量廉价物品，充斥中国市场，中国的手工业经济进一步遭受破坏。中国可输出的丝、茶等与西方贸易的结果是严重亏损。整个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愚昧而凶残的清政府，在列强面前是羊，在人民面前是狼，把财政困难转嫁给中国人民。

国家主权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蚕食鲸吞，使清朝政府的权力和威望急遽下降。不堪忍受政府过重赋税和侵略者剥削、欺侮的中国人民，被迫起来反抗。持续九年，蔓延数省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失败之后，于1851年开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义农民占领了南京，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和侵略者。以后，还发生了“捻军”和其他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说明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于是，清政府和侵略者内外勾结，沆瀣一气，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其他农民起义失败之

后，在反动政府压迫下，一些在国内不能立足的人，只好出洋出卖劳动力。清廷认为这是缓和阶级矛盾，减轻压力的途径，干脆把禁止擅自移民的法令，予以撤销。

（二）出洋的苦难

明末清初，我国就开始有人在国外定居了。但他们多是生意人，不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出洋谋生，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前后开始的。这一时期出洋谋生的人，去的地区和国家很多，就现在看，华侨人口较多的是东南亚和美洲两个地区，而其中又以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居首。因此，以到这两个国家谋生者的苦难历程，是最能说明早期华侨的生活情状的。

1、去印尼的“契约”华工的苦难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到1880年，去印尼的华侨逐渐增加到三十四万三千七百多人，其中多数是体力劳动者。这些人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由劳动者和“契约”劳动者两类。两者虽然都受到殖民者和侨居国政府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但在人身自由和受剥削的程度上，是有很大不同的。自由劳动者一般是自备路费，又称为现单新客，他们人数较少，到达目的地后，大多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工作不大成问题，也有一定的选择权。而“契约”劳动者，自己没有路费，是赊欠旅费去的，被称为赔单新客。当时，这种赊欠旅费的手续，西方

人称为欠费移民制。在这种制度下，移民可以立约赊欠旅费，先由客栈主人、客头（或客贩）垫付或与船主谈妥，决定一批“赊单新客”的船费的预付或暂欠，把他们控制在手里，变成自己的奴隶。新客运到目的地后，由客栈主人或客贩卖到雇主手中时，多报旅费数目，从中取利。而雇主垫付的旅费，再从新客以后的工资中扣回。这样，作为“赊单新客”，在未被卖出前，受到客贩的随意摆布和严格管束；卖出后，由于与雇主订立了“契约”，等于卖身给他们，几乎没有恢复自由的希望。

这种以立约赊欠旅费的“赊单新客”，从落入客贩之手到被卖出之前，由于其政治和生活待遇与牲畜无异，被蔑称为“猪仔”。其含意有三层。首先，在运载出洋时，把许多“赊单新客”推入舱底，拥挤一堆，与运载猪豚一样。其次，他们被运到新客馆之后，又被赶入用圆木柱排立围成的大栅栏，如现在内蒙圈羊一样，把他们关闭在内。再次，他们本是被客贩以“招工”名义骗来的，如今客贩反过来，认为他们所以容易上当受骗，是由于象猪一样蠢笨、怯懦、驯服，在人格上予以嘲弄和轻蔑。

与“赊单新客”被称为“猪仔”相对立的，客贩就被称为“猪仔贩”，西方人称为“苦力经纪人”。“猪仔贩”除自己牟利外，实际上也在为外国资本家服务。十九世纪中期，荷兰殖民者为了开发印度尼西亚的需要，指使其走狗和帮凶包工头，到中国南方沿海各省，引诱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少数失业贫民，以及沿海人民出洋做工，供荷兰殖

民者剥削，使华工终身陷于苦海之中。

东南亚各地的种植园主和矿场主，提出所需“契约”劳工的人数与条件，委托厦门、汕头、香港、澳门等地的洋行代为招买，洋行再委托专管贩卖人口的“猪仔馆”包办。

“猪仔馆”接受洋行委托后，即付款给客头或猪仔贩，由他们分别到各乡村活动，用“招工”等各种欺骗手段，引诱失业者误入其途，然后集中到“猪仔馆”，运往新加坡和檳榔嶼两大转运口岸，最后再分运到其他地方。在1855年之前，印尼的华侨契约工人，绝大部分是从这两个口岸供应的。

“猪仔”的苦难和“猪仔贩”的残忍，集中反映在“猪仔馆”和船舱两个地方。

“猪仔馆”在我国，设立较早和最多的是澳门。在1855年以前，就有公开进行贩卖人口罪恶勾当的“猪仔馆”。出生在澳门，最早到美国寻求知识的中国留学生，后来成为清朝著名洋务家的容闳（字纯甫），在大学毕业回到澳门时，看到“猪仔馆”惨无人道的状况，作了这样的记述：“当1855年，余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那为无数华工以辫发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西学东渐记》第7章）澳门自被葡萄牙殖民者强占之后，殖民者怂恿坏人作恶，包庇“猪仔馆”，奖励“猪仔贩”。对此，十九世纪居住在香港的政论家王韬指出：“其中最可议者，莫如招人出洋一事，盖招工者每借词于出洋开垦荒土，自有此举，而匪徒遂视为利藪，拐诱鬻败之弊，层见迭出，愚民无知，受其陷害，入其